

新中国 重大外交事件纪实

主编
◎ 刘新生

上海辞书出版社

XinZhongguo

ZhongdaWaijiaoShijianJishi



新中国 重大外交事件纪实

主编◎刘新生

上海辞书出版社

XinZhongguo
ZhongdaWaijiaoShijianJi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纪实/刘新生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26-3156-8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外交史—大事记—中国—1949~2010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5030 号

责任编辑 林益明
装帧设计 汪溪

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纪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6 $\frac{6}{18}$ 插页 1 字数 339 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156-8/K·723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5842745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迄今已经度过 60 个光辉春秋。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新中国外交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外交鲜明的特点是独立自主，从不屈从于外来的压力。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平等友好地交往，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历来坚持原则，伸张国际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也使中国外交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工作取得新的成就。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处于深刻演变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中国对外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0 年的新中国外交实践，丰富多彩。本书的撰稿人大多是曾长期战斗在

外交第一线的资深外交官。他们以自己的亲身参与、亲眼所见，栩栩如生地写出了重大外交事件的过程、生动的外交细节、感人的外交风采，进而多视觉地回顾了新中国的外交历程，生动地展现了新中国的外交成就。将这些回忆编纂成册，既是生动的共和国外交史教科书，也是学者研究新中国外交的珍贵资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我们能向社会奉献此书深感欣慰。同时向为出版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2009 年 6 月 25 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三大决策”	
——新中国的开国外交壮举	金桂华 1
新中国外交代表首次亮相国际大舞台	周溢潢 11
毛泽东在莫斯科	李同成 22
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	杨冠群 30
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西方	
——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纪实	齐建国 45
援越抗法纪事	张德维 56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来龙去脉	郑瑞祥 67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揭秘	李同成 78
周恩来魅力挥洒万隆	刘新生 88
国际关系史上的创举	
——中美大使级会谈纪实	张 兵 99
震惊世界的“中国九人案”	朱祥忠 112
新中国与非洲交往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周恩来总理首访非洲十国	陆苗耕 120
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	
——援越抗美追忆	李家忠 133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始末	周晓沛	143
中美“乒乓外交”始末回顾	金桂华	155
一次特别神秘的破冰之旅		
——我参与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唐龙彬	170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写真	吴妙发	183
震惊世界的一周		
——记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唐龙彬	194
亲历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实	江培柱	205
回忆我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经过	王殊	217
中英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首次交锋		
——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谭兴举	225
邓小平揭开中苏关系新篇章		
——参与接待戈尔巴乔夫访华追忆	鲁培新	235
亲历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潘占林	242
中美撞机事件的前前后后	王立	255
上海合作组织诞生始末	张德广	262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中国申办上海世博会追记	吴建民	266
中非峰会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成功实践	黄舍骄	279

“三大决策”

——新中国的开国外交壮举

中国前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大使 金桂华

新中国成立迄今已有 60 年整。60 年的新中国的外交历程或可以 12 字而蔽之：波澜壮阔，叱咤风云，可歌可泣。60 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新中国外交也在不断演变，先后经历了革命化外交时期、调整外交时期和务实外交时期，演变中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回顾新中国外交的 60 年，可谓是重大事件不胜枚举，然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三大决策”，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非同小可。正是凭借这“三大决策”，新中国才得以成功地在危机重重的国际冷战中站稳脚跟，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开端。

“三大决策”的由来

“三大决策”的酝酿其实由来颇久。

早在 1947 年 3 月，毛泽东主席即与有关的外事工作人员谈及今后外交上应“另起炉灶”的设想。他曾说，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

嗣后，毛主席又在诸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重要文告中宣示，要“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等。毛主席更在被誉为“纲领性文件”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就是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1948 年 9 月和 1949 年 1 月初，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会

议也讨论了“三大决策”问题。会上，毛主席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在谈到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毛主席说，“现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也不忙。”周恩来副主席也发言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魄。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表明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所有外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相互派团进行互访。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米高扬此行的使命是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内外政策。会谈中，毛主席明确地向米高扬表示，中共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位置”。毛主席还十分形象地对米高扬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说，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毛主席此处所言的需“清理”的“脏东西”，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接着，毛主席决定由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于1949年6月下旬访苏，同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商谈国际形势、苏向新中国贷款和派遣专家、中苏间的交通和贸易等问题，双方最后签订了贷款协定。

此时，“三大决策”实际在中共内部已获确定，但在水到渠成前，尚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一是召开两次历史性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予以正式确认。

在澄清党外模糊认识方面，有两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一个有意思的政治插曲。此时已弃暗投明的张治中先生向中共提出了在美苏间保持中立的主张。有鉴于此，毛主席特地约请了张治中。毛主席对张明确地说，“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其二是数月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主席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文中详细阐明了“一边倒”的理念。毛主席写道，“一边倒是

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三大决策”的最后拍板定案和正式对外宣示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总结发言中宣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同时，他又重申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说“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是为新中国的诞生作最后的准备。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正式法律化。《共同纲领》庄严宣布“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多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定，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或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三大决策”的贯彻

“三大决策”，意义重大，它实为意在解决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和急需解决的三大外交难题。“另起炉灶”是为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与世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彻底摧毁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类控制；“一边倒”则是为奉行“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战略，同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为盟友。

“三大决策”，互为表里，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苏签订友好新

约是中国实施“一边倒”的重要标志，然而它实际上是“另起炉灶”的结果。而中国的“一边倒”决策又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诚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但也适用于所有外国（包括苏联）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大决策”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在贯彻上雷厉风行，在其革命精神指导下所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惊天撼地。

先说“另起炉灶”。

建国伊始，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自然是同世界各国重建外交关系。但建立也不能说建就建，中共中央订立的方针是建交须严格遵循“另起炉灶”的精神。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叫做：中国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不承认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一切对外关系。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将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

对新中国的成立，世界各国反应不一，有欢呼，有承认，有保留，也有反对，其中尤以如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阴毒反应最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惕。据称，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成功接获了一份来自美国的绝密报告，内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中国的政权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同时，1949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滞留于解放后的南京，试图同中共接触。但他在同黄华的接触中，虽表示

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强调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是新的中国政府应保证西方国家享有所有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的决策者还分别向一些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发送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会，要求他们同美国结成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此类事更使毛主席坚信：“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进行干涉”是一个客观规律，“从内部来实施破坏”则是美帝当时对新中国所能采取的主要的干涉手段和形式。

由于客观情况千差万别，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果断地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此专门指示说，遗留在中国的外国使领馆，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我们一概不承认其外交地位。此后建交工作，要通过谈判进行，他们必须表明与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我们才予承认。

本着此项政策，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通过来往照会，迅速实现了相互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迅速互派大使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的次日，苏方即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互派大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随即相继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我国同11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不需要经过谈判进程的情况下，迅速地完成了建交和互派大使的程序。

对一些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我们的做法有别，但也只是一般地要求通过谈判来实现建交，程序也比较简单。个别情况如印尼，因它成立于新中国诞生之后，未曾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建交，我们也采取了不经过谈判即行建交的做法。

至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则必须“通过谈判”，概莫能外。谈判是为了满足我国的两个条件：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接受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急于求成，甚至还有意选择“等一等再说”，必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还有一个新创举，即同外国“半建交”或称“建立半



1949年10月，周恩来外长具函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送达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新中国愿与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外交关系”。这具体表现在双方同意互派代办而非大使。最初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即属此类“半外交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与我建交的国家共有 22 个。

顺便说一句，“另起炉灶”其实不只是限于同外国建交。毛主席说，“外交队伍要另起炉灶”。

再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此项决策与中国的近代史密切相关。旧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长期备受帝国主义控制和蹂躏的历史。自 19 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各种侵略手段，迫使中国订立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的特权无数。他们在中国享有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司法权、自由经营权，甚至驻军权，中国已是主权丧尽，实际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正因如此，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新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定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彻底摧毁他们对中国的各类控制，完整无缺地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早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就已开始一一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建国后这一步骤更呈加速之势。自 1950 年 1 月始，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果断地采取了如下措施：先后收回了美、法、荷、英等在中国的兵营；宣布由中国政府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规定外轮一般不准驶入中国内河，经中国政府特批而驶入的外轮须悬挂中国国旗并在指定的码头停泊；鉴于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和英国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行动，发布了“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并征用一些英商在中国的财产；同时，还有步骤和有区别地处理了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或津贴的各种文教卫生机构，实现了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特权，也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比如，在征用北京的美国兵营时，美国人就横加阻挠。美国国务院大肆宣扬北京市军管会的决定“违反了 1901 年给予美国的、并在 1943 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对此，新华社于 1950 年 1 月 18 日专门发表评论驳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已明白宣布，要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不管它们是“久已存在”的也好，是 1943 年重申过的也好，北京市军管会有义务执行《共同纲领》，但绝无义务执行这些不平等条约。评论并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华所制造的

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新华社的这篇评论典型地表达了新中国在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方面的坚强决心。

最后是“一边倒”决策。

应该说，“一边倒”决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它导致中国在一段时期内一个全新外交布局的形成。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中国态度鲜明地“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此事早在建国前夕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即已开始酝酿，但最后的瓜熟蒂落却是在建国伊始毛泽东主席访苏之时。

对“一边倒”，邓小平同志在建国前夕有个独到的解读。他说，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而“打破封锁之道”即是“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实现“一边倒”，核心问题之一是中苏之间需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以重新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崭新中苏关系的法律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原先已于1945年同苏联缔结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此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在多个方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废除此约即是新中国实施“一边倒”的前提和必循之途。早在刘少奇同志访苏时，就曾当面直告斯大林，中国人民对苏军驻扎旅顺、苏联拆迁中国东北的厂矿设备，以及外蒙古独立等问题颇多不满。嗣后，毛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即建国后尚不足三月）即应邀赴苏联访问，与苏方商谈废除中苏间的旧约、缔造新约、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以实现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一边倒”。

毛主席此次访苏其实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曾有过戏剧性的波折。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时，苏联党和政府的欢迎是盛大而热烈的。毛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首次访苏。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中苏了解和友谊，加强了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合作。图为毛主席在赴苏专列上办公

新中國史話：外交事件紀實

主席在12月21日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的致词，全场曾三次起立表示敬意。原定毛主席将于12月23日或24日与斯大林会谈，但苏方突然变卦，毛主席被冷落了10余天。估计原因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即明确否定中苏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再加上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片面地根据高岗提供的对我党中央进行诬蔑和挑拨离间的材料，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引起了苏方的误解和不满。苏方态度的变化激怒了毛主席，他因此闭门不出，只是读书阅报了若干天。毛主席生气地对苏方接待人员说，我来苏联并非只为祝寿，我还有重要的双边关系问题要与苏方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会谈，并把科瓦廖夫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苏方态度的转圜是在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在与我方会谈中首次明确表示苏方同意签订中苏新约。于是，毛主席便于14日至16日访问了列宁格勒。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一行也随即于1月20日飞抵莫斯科，同苏方展开谈判。周总理在谈判时坚持原则，展现出“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致使苏方代表“感到很惊讶”。2月14日，在斯大林和毛主席的亲自参与下，周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助华建设50个企业协定等。为了庆祝毛主席访苏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同志在莫斯科最豪华的酒店举行了隆重晚宴，从不出席克里姆林宫以外的任何盛宴的斯大林却



毛主席
与斯大林在
一起

首次破例出席，这轰动了整个宴会大厅，也为毛主席的此次访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边倒”的决策功不可没，它使新中国得以站稳脚跟，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并发展了自身的经济。中苏关系在缔结新约后曾友好过若干年。尽管后来我外交政策因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实施修正主义路线而作了重大调整，“一边倒”决策的历史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三大决策” 的贡献

说起“三大决策”，就不能不提及1952年4月下旬在外交部召开的新中国的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这“三大决策”作了最为权威的阐述。

周总理先是简要阐述中国的总的外交政策。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周总理接着着重阐明新中国外交的“三大决策”。他说，关于“另起炉灶”，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就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关于“一边倒”，周总理说，在1949年党的28周年纪念日之时，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方针，宣布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在说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时，周总理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

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除上述的“三大决策”外，周总理还谈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等外交方针。

“三大决策”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而今国际形势已剧变至和平与发展年代和后冷战时期，这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断相应地进行调整，今昔自然不能相比。然而，历史不应遗忘。“三大决策”毕竟是新中国的一笔重要外交遗产，后人岂能无视。

说“三大决策”是新中国的一笔重要外交遗产，并非指我们应旧例照搬，而是主要指它所包含和体现的精神颇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这个“精神”，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的革命性，二是它的斗争性，三是它的无畏无惧性。尽管当前中国外交已调整为务实外交，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双赢，坚持以人为本，然而在外交实践中勿忘这“三性”应该并非是多余的。